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

第一輯
第一分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PDG

主編

胡秋原

編輯

王家儉
王國禔
李國禔
鄧汝言

第一輯序言

一

在今年是南京條約簽訂的一百三十年紀念之時，「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第一輯出版問世。現在要對此書的由來，全部計劃及其構想，作一說明。

民國四十八年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人郭廷以先生提議編纂一部「近代中國對西方認識的資料彙編」，最初推我主持其事。當時決定，這部書的內容，以中國政府與民間對於西方的理解、言論、研究、應付方策為主體。至於中外交涉之由來及其經過，則不在其範圍之內。換言之，這是西力東來以後國人對列強世界的觀念與對策之史料，有別於一般中外交涉事實之史料。

當我開始接受此一任務之時，便考慮這一部書編輯的方針和體例。當時和本所參與編纂同仁商量後，決定下列四點：

- 一、對西方之認識即對西方之知識與思考，當用編纂思想史料的方式。即以重要人物為主，選錄其重要文字。
- 二、注意西力東來後立國之道之探求問題。西力東來後不僅引起外交問題，也發生內政上之變化與適應，以至於整個文化之變化與適應問題。而且由於世界局勢的變化，在對西方之認識與應付之後，又發生了對蘇俄及其共產主義的態度問題，而前者成為到後者之過渡。將我們對外的認識和應付連續起來看，就是民族運動、建國與革命方向問題，也就是立國之道的探求問題。

- 三、依據內外形勢之變化及整理資料之便利，先定全書為下列八輯：

第一輯 道光元年至咸豐十一年（一八二一—一八六一）

此包括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南京條約，太平軍之起及第二次鴉片戰爭與俄力東來時期；亦阮元、林則徐、魏源、馮桂

芬、李善蘭等開始研究西事西學，總理衙門設立之時期。

第二輯 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三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

此包括太平天國滅亡，曾國藩李鴻章等開始洋務、新政、自強運動，設江南製造局、馬尾船政局、同文館、招商局、始派留學生之時期；亦王韜、鄭觀應首先討論變法問題，申報創刊，以及教案初起之時期。

第三輯 光緒元年至光緒十年（一八七五—一八八四）

此為洋務運動繼續進行，創設海軍、電信、水師學堂，派出使大臣時期；亦中俄伊犁交涉、日佔琉球、中法戰爭、英侵緬甸、中日初次出兵朝鮮、美國排斥中國移民之時期；亦郭嵩燾、曾紀澤、馬建忠討論洋務之時期。

第四輯 光緒十一年至十九年（一八八五—一八九三）

此安南屬法、緬甸屬英、朝鮮由中日共同保護時期；亦為洋務運動之發展、津沽山海關京津鐵道完成、紡織工業及官民合辦紡織事業開始、張之洞在鄂設四局及火柴廠與自強學堂之時期；亦長江一帶人民與外人衝突頻發，薛福成、何啟、胡禮坦、陳虬、陳熾討論救國問題之時期。

第五輯 光緒二十年至二十六年（一八九四—一九〇〇）

此為中日甲午戰爭，俄誘清廷成立密約，列強進行瓜分中國時期；亦清廷始立新軍，張之洞創辦鐵廠、武備學堂，伍廷芳抗議美國排華，孫中山組織興中會，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發起變法運動，強學會等學會成立、時務報等報紙創刊、商務印書館、京師大學堂成立、張之洞刊勸學篇，嚴復譯天演論之時期；亦戊戌政變、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入京時期。

第六輯 光緒二十七年至宣統三年（一九〇一—一九一）

此辛丑條約成立、清廷下詔變法，改革官制、廢止科舉、準備立憲之時期；日俄在中國作戰後、英法日俄成立協商、日俄英瓜分滿蒙之時期；亦留學生發起拒俄軍，東南抵制美貨、同盟會成立，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辛亥革命爆發之時期。

第七輯 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二年（一九一二—一九二二）

此民國成立後袁世凱解散國會，第一次大戰爆發，日本出兵山東、帝制、復辟、護法、南北分裂與巴黎和會同意日佔山東時期，亦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後國民運動發展，中西文化論爭劇烈，種種戰後思潮與馬列主義輸入及中共成立之時期。

第八輯 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四—一九二七）

此國民黨改組、出師北伐、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國共分裂、中共發動南昌暴動、成立廣州公社之時期。此亦關於社會主義、人生觀、古史問題與聯俄容共政策論之時期，亦蘇俄共黨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論爭之時期。

當時其所以決定編到民國及民國十六年止，即因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對西方認識過程中之最高潮；而在新文化運動後，對中國最重要問題已非對西方及其文化之認識和評價，而是對蘇俄與共產主義之認識和評價。由新文化運動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有內在的關連；而民國十六年以後中國共產運動之根本方向，在十六年已經由史達林加以確定。

一旦八輯完成，十六年後資料自仍當繼續編輯。

四、編纂之工作，期能供給進一步研究之便利。

我們的工作有三：一是資料選錄之事。這包括蒐集材料、選擇材料、抄錄、標點、分段、更正原文錯誤，並註明來源。二是整理之事。我們不可像叢書體裁，變成資料堆棧，必須將這些資料整理得像一個百貨公司。這便是首先依一個時期的重大問題，其次依人的職位與重要性，再依時間次序畧定先後；同時亦依文字內容以類相從；務期足以表示關於當時重大事件之主張和決策之發展和關聯以及種種影響。然後就每一期所有文件，再作一分類目錄。這種分類不一定是嚴格的，因為一篇文章可以涉及幾方面的問題，所以只能就其要點歸類，而這總比沒有好。三是參考資料之準備。這包括作者小傳以及選錄文件之來源，大事年表，包括著作出版，及有關人物之生卒年代。此外，還應加上重要名詞索引以及引用書目。

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只限於資料之選集、整理並供給研究者以便利。這工作本身不算研究工作。即以作者小傳而論，要寫一篇很好的傳，是一種研究工作。我們只就各種現成的傳記加以摘錄，提出重要事實，不加解釋或批評。

這是這一部書之由來和全書計劃。

一一

以下要由幾個角度對上述編纂之用意與構想，加以說明。

首先要畧說思想史之意義。

就歷史之內容而論，歷史是由「社會人」的活動所造成的。但歷史之特色是變動的；而一切歷史上實質的變動，技術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變動，總以思想的變動為其先行。固然思想由事實與行動而來，然一切有意識的、有組織的行動，總基於對一定問題之一定的認識、理解和觀念。所以，歷史亦可說由「人與觀念」所造成。再者，歷史上之事實，因記載之不全與歧異，其確定往往非常困難，甚至許多大事至今仍然是謎者，不知多少。然史料之中最無問題者莫過於思想史，因思想是以自身提出於我們之前的。而種種的思想又一方面反映當時的現實，另一方面，又總結為一定時期之決定的活動。所以，思想史在今日史學上佔一重要地位。而研究近百餘年中國的思想史，是理解近百餘年中國歷史的鑰匙。

其次，就歷史之功用而言，是「鑒往知來」。此語在今日史學上有更新意義。我們由過去了解現在之形成，而由過去到現在之形成，自可作將來之推論。所以史學不僅是過去之學，實為現在之學，將來之學。我們由過去對當世列強及其文化的理解和應付之得失，可以了解今日事勢與成敗之由來，也便可作為將來出路之教訓。

第二是鴉片戰後中國歷史之意義。

一個民族的歷史總是由一民族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所謂外部因素包括自然環境、國際環境、世界文化學術思想狀態；所謂內部環境包括一民族之技術，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內部之調和與衝突狀態以及思想學術狀態等，此所謂思想學術自亦包括對外界的種種知識在內，而此如上所說，是歷史之動力，但其作用之大小須受其他技術、制度因素之節制。一般而言，技術的水準無論對外對內，都表現決定性的作用。

由此觀點看中國長期歷史之過程，可以外部形勢之變化分爲三期。(一)自遠古迄於三代，中國歷史大體上活動於中國固有疆域之內，而中國的固有疆域，大體上在一種孤立狀態，此與西亞及地中海世界之四通八達，恰成對照。中國之古典文化，即是在此相對孤立狀態中對自然環境而發生和形成的。

(二)自戰國已降，塞外的遊牧民族即與中國發生頻繁接觸，首先出現的即是匈奴。自此中國歷史即因塞外民族之衝擊而發展至於域外，而與整個亞洲史不可分，而中國文化之範圍與內容亦因此而擴大。

(三)元明以降，世界大通，中國史與世界史已經不可分離。明代以降，海運大通，全世界歷史打成一片。然因明清之閉關，一時使中國與世界隔絕。在十七、八世紀，西方教士、商人及使節來華者甚多，然中國對世界新變化則茫然如故。不過歐洲、美洲、印度正在多事之秋，歐人尙無暇問鼎於中國。直到滑鐵盧之戰，英國擊敗法國，成爲歐洲雄長，乘工業革命之高潮而東來，對我發動鴉片戰爭，才使中國突然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即李鴻章所謂「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在過去，中國之外患是塞外遊牧民族，他們雖然可利用其騎射之技，乘中國之內亂爲患，然一般技術與文化遠較中國爲低。我們可以築長城，憑長江，乃至於植柳樹，以妨其馬足；或利用我們的財富分化其內部；而一旦我們決心作戰，亦可以強弓駿馬，橫掃漠北。即令有時被他們征服，中國的生活方式和文物制度仍保持其崇高地位，終使他們同化。我們是亞洲先進國、安定力，對弱小國家負保障、協助的責任。我們被尊稱爲「上國」，亦自稱爲「天朝」。然鴉片戰爭以來的「海國」不同了。他們的船堅砲利爲我們所不如，因而無力抵抗；他們的文物似乎在我們之上，而與他們的富強相較，我們成爲貧弱之國了。李鴻章所謂「三千餘年一大變局」者，即中國自此不復爲「上國」，而是落後之國，不斷受外國人的侵略，攻擊、肢解、控制，直至今日，全中國民族並未能脫離外國實質的壓力和控制。

於是一百三十年來我們一切努力，日益集中於應付這個變局。開始由外交上應付，然和則割地賠款，戰則引起內亂。繼而由政教學術上自變以求應付。然或則無效，或則引起新的內爭和外患。即在和平相處的狀況下，在外人的優越經濟勢力下，我們的社會經濟日趨破產和瓦解。在瓦解之中，中國進入一種殖民地化的過程。不僅外部的變局引起內部的變局，而因

外部變局又在不斷的變，也便引起內部不斷的變。要之，世界列強用他們的模型，塑造中國，改變中國。變有變好和變壞。變到今天，中國已失其原形了。中國變到民國前夕，中國固有領土，縮小了一半。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又繼續縮小，時至今日，中華民國僅存於島上。而以人民的生活狀態而論，大陸人民生活之慘苦，幾為有史以來所未有；而如果這裏的汽車、電氣冰箱和電視之類，是我們祖先所未見，然那也只是外人技藝之餘波，不是我們自己發明和創造。而連帶而來的變質變惡之處，真不知凡幾。變到如今，我們依然在「落後地區」之列。我們是被動因變的（被變及隨他人而變），而不是自主自變的。在我們是「上國」時代，外人以同化中國為榮。百餘年間，我們日益同化於他人，或以同化外國為榮了。我們不僅失去自主命運之能力，而且失去自主命運之意志了。而此必然之結果，是利用外力來損害自己的同胞與國家。

這不是一時的富強貧弱、軍事之勝敗、經濟力之高下問題，也是中國文化價值問題。各民族為生存與進步而創造其文化，而他創造的文化亦是其保持其生存和進步之工具。在過去，中國民族所創造的文化或文物制度，對內能保持內部的和諧，維持民族的生活，對外能保障民族之生存和發展，並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貢獻，保持其獨立的乃至經常的領導地位。一百三十年間，我們的固有文化日益證明不能應付外來的勢力，而我們亦甚少新的發明和創造。一百三十年來，我們縱然由外人方面傳來若干新的技術和知識，然如果一想到此非自己所創，二想到此不一定能為全體國民所共享，再想到此與過去中國在世界上之取與地位不能相比，則不能否認這一百三十年是中國民族及其文化之衰敗與墮落時代。

此一衰敗，開始固由於知識落後，中外國力不平衡而來。然歷時一百三十年之久，外來的壓力固然與日俱深，而我們也作了莫大之努力，而以我國之地廣人衆，始終不能建立平衡的國力，而自始一直忙於爭論是否應該以外國為建國模型，繼而因外國甚多，乃爭論究竟應以哪一外國為建國模型，因而究竟應以親此一外國還是彼一外國為外交之國策，並因此而相詬訾，相砍殺者，則對於中國文化只能作兩種推論：

第一、中國文化，包括中國文字在內，根本不合於現代生活，只有歷史的博物館的價值。假使如此，中國依然只有選定某一外國作自己的模型。然這結論還要牽涉中國民族有無獨立生存之資格問題，因一民族之獨立生存能力是要以他自己文化

創造力來證明和保證的。

第二、不是中國文化沒有價值，而是沒有發展，並在一百三十年間，對西方及列強之理解與應付有失誤之處。在中國歷史之第一期，中國文化有憂憂獨造的成就，不遜於同時代之西方。在中國歷史之第二期，我們對塞外游牧民之應付是成功的，因而有中國文化之發展與光輝；我們長期先進於西方。但十七世紀以後，中國文化之發展逐漸停滯而西方則突飛猛進，至於鴉片戰爭，則一百餘年應付近世海國及其他列強在總結上失敗，才有今天中國民族及其文化之衰敗。假使如此，我們便要檢討一百三十年來，我們對當代世界之理解與應付，究竟失敗在於何處。

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所提出的最大問題。要對這兩個結論加以判斷，都應首先研究一百三十年的歷史和思想史。

三

所以第三、要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思想史的特點與過程。

所謂思想，是對一切自然、社會、人文問題而為思想，他是文化創造之原動力。在獨立的或文化先進國家，其學者之思想結晶為哲學、各種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藝創作。對外國及其文化之研究，只是一部分人或外交家之事。近世西方各國如此，我國過去亦如此。

一百三十年來的中國思想史則不然。外國的壓力形成民族存亡問題，而固有文化不能應付。所以對外國之理解，對他們文化的態度，形成思想界學術界之根本問題；其他種種學術問題，都附屬這一問題之下。這就是說，中國出路問題，中國立國之道問題，是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之中心問題。

然世界及其思想在不斷的變化——由歐洲中心及其分裂到蘇俄共產主義之興起到美俄兩大之對立，使我國的社會和思想隨之而變，而這種種的思想過程變為實際的行動，終於造成今天的情況。要之，近百餘年的中國思想是對世界局勢與思想而思想並隨世界局勢與思想之變而變的。

這表示近百餘年中國思想史的落後性。然而我們所曾討論的西方文化問題，共產主義問題，現在已成爲世界問題了。所以在近百餘年的思想中也表示中國思想史的先進性。

現在且對鴉片戰爭以來世局變化和中國思想變化之過程作一概觀。

鴉片戰爭以來，世界局勢發生三期變化：(一)由鴉片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二)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末以來。

(一)第一時期之大勢是：十九世紀是英國世紀，英國領導西方國家進攻中國。繼而英法對立，法俄成立同盟，英國爲了對抗，扶持日本。繼而法英俄爲了對抗勃興的德國，又成立英日法俄協商。凡此一切，在遠東都是爲了進攻和瓜分中國，也終於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思想文化而論，在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也可說是西洋文明的代表。在歐洲大陸雖有不同的東西，然中國人所知的西方文明，尤其是通過第一外國語之英語，主要是維多利亞式的。

當英國和西方勢力——鴉片、基督教、船砲、民主、科學等來到中國之時，我們首先接受的，是「鴉片」——當拒絕鴉片後，曾想拒絕一切，終於被英國船砲打敗，而有南京條約。當時已有魏源等討論洋務及自強之道，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與「以夷制夷」；也有人研究船砲之術。無論如何，此在當時，總是覺悟之開始。但清廷得過且過。因爲他們只要能維持對漢人的統治，便爲滿足。繼而太平軍事起，以西方宗教從事反清，英法乃乘機發動聯軍，而俄人便乘機併吞邊疆。曾國藩以「名教」爲名，組織湘軍對抗洋教的粵軍。直到靠洋兵洋砲打平太平天國，曾國藩、李鴻章等開始洋務運動、自強運動尋求「富強」之道，也就是尋求新的立國之道。而這已是鴉片戰爭二十四年之後了。他們並且以爲這答案即在接受西洋的長技之船砲——火輪船與開花砲——二事之中，而這也是魏源等早已在二十幾年前說過的。此時已有王韜、鄭觀應等有進一步認識，提出變法問題，而李鴻章不以爲意。他進行了三十年的洋務，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清廷仍不省悟，由李鴻章到俄國訂立同盟，也就是實行魏源所說的「以夷制夷」，結果是瓜分之禍。於是有康有爲等的變法運動，而孫中山的革命亦同時而起。

清廷之無望，促進革命黨之聲勢。辛亥首義，成立了中華民國。革命黨人未能收拾局勢，外患依然不已，而政權則入於袁世凱之手。此一軍閥之祖，實為洋務運動之子，是很多人忽視了的。

(二)到了民國三年，世界第一次大戰發生了。東亞成為日本天下。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對德宣戰，實則進攻山東。袁世凱則以尊孔為名進行帝制運動。於是有「新青年」為首之新文化運動。及巴黎和會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五四運動起來。而帝制運動亦使中國陷於分裂。

梁啟超先生在民國十一年「中國五十年進化概論」一文中曾要約近世中國思想運動或建國運動之要點。他說中國五十年之進步，就是一步步感覺自己之不足，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繼而從制度上感覺不足，最後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他所謂自知文化不足，指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後中國思想界的空氣。甲午戰役後約二十年間，「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至民國六、七年間，更「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所以要「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這表示中國文化之全面危機，即是已經達到中國文化之全盤否定，即第三節所說的第一結論了。由於大家認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主潮，故以全部西化為立國之道，是當然的結論。

然而正在這時候，世界形勢一變，因而中國環境又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亦即西歐的勢力漸衰，英法只圖保持凡爾塞系統的現狀。日本起於東方，美國起於世界，而俄國則在革命以後出現了共黨一黨獨裁政權，有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運動。自此日美蘇俄角逐亞洲，代替了過去的歐洲列強。日本以亡華為職志，蘇俄則利用其進攻而漁利。同樣重要或更為重要的，過去自以為至高無上的西方文化之權威動搖，西方人有「西方沒落」之感；而蘇俄共產主義繼而義德的法西斯主義由左右兩方攻擊傳統的西方文化。這就是西方人所謂「西方文化之危機」。梁啟超在上引同一篇文章中說，「馬克斯幾乎要與孔子爭席」。他所說的馬克斯，還不是德國的馬克斯，而是俄國人的「馬列主義」。此表示中國知識界不僅自知中國文化不足，並知西洋文化亦不足，即中國人遭遇一個「二重的文化危機」。中西文化危機同時發生，在思想上解決二重的文化危機之無力，乃是此後中國種種運動和失敗之由來。

新文化運動使中國新舊、中西之爭達到最尖銳程度。繼而在二重文化危機中，中國思想界分裂為傳統、西化、俄化三大派。中國知識界既失望於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中之祖日，華盛頓會議對中國收回權利要求亦口惠而實不至，遂使蘇俄「反帝」與馬列宣傳在中國播種生根而逐漸成長。過去提倡科學、民主的陳獨秀變為共黨家長。而政治上，由五四開始的國民運動則日益擴大，一般青年分別集中於國民黨、共產黨兩大團體之中。而國民憤於外侮，亦切望統一對外，國共亦一時合作。然日本決不願見中國之統一。在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統一運動進展中，日本開始出兵濟南。而蘇俄亦不願見中國有非共產主義的統一。國共分裂後，他命令中共開始蘇維埃運動。及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希特拉起於歐洲，要起來打倒英法。法西斯主義潮流到了日本，軍閥效法法西斯運動，並發動九一八事變。而蘇俄則利用日本之侵略而侵略。在三十年代的中國，種種傳統主義、西化主義、俄化主義互相競爭，亦有種種折衷，亦皆集中於對日政策、建國與出路問題。日本不斷的進攻使人心逐漸集中於民族主義的抗戰，中共在江西的蘇維埃政權亦歸消滅。七七砲聲一響，全國也在「抗戰建國綱領」之下統一起來，對日奮戰。不過幾頻消滅的中共亦因日本進攻而死灰復燃，並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因緣之下成立了兩個軍的武力。繼而第二次大戰與太平洋戰爭發生，中美成為盟國。而我國終於在血戰八年之中和以後，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得日本投降，並為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我們似乎有和平建國之最大希望了。

（然而在勝利前夕，世界局勢又發生大變化了。隨着英法德日之崩潰，美俄成為兩個超強權，從事冷戰。在日本投降前半年美英與蘇俄訂雅爾達條約和密約，將世界心臟地帶的東歐和滿蒙劃為蘇俄的勢力範圍，也便造成蘇俄在冷戰中的優越地位，並使蘇俄得以在兩枚原子彈下降日本後進兵東北，然後武裝中共，打入關內。日本侵略，削弱了國軍的力量。抗戰勝利，使戰時思想界的統一再分裂為昔日的三派。而蘇俄與中共之內應外合，造成經濟混亂，也便能使俄化主義的氣勢高漲；而美國太平洋學會之鼓吹，復使西化派相率轉為俄化派。於是在俄化主義的籠罩下，全國失去抵抗力，俄化派的中共也就取得了大陸之政權；強制推行蘇俄的制度，於今二十三年了。這一變局，是比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更重大了。

統觀這一百三十年的中國歷史，中國的外部形勢是由歐洲侵略到日俄侵略到美俄支配與競爭。而中國思想史，即求新的

立國之道的努力，則由洋務運動到變法與革命，以求富強；由新文化運動而共產主義運動，由外抗強權內除國賊而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由南北分裂而北伐統一而抗戰，由聯共而反共而再聯共，而在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再軍事衝突，終於大陸成為共黨天下；一言以蔽之，由洋務運動到大陸的共產政權。然則這共產主義是不是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和立國之道的結論呢？這不僅是中國當前的最大的政治問題，而且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最大的學問問題。而此一問題之答案，不僅關係中國民族千年萬世的命運，也關係亞洲和世界之將來。回避這個問題而談史學與學問，只表示學問之麻木、空虛與無能。於是我們就要連同以上第二節之未提出的兩個問題，合併考慮，考慮答覆。而在答覆如此大問題之前，還當考慮答覆的方式。

所以第四、要說答覆上述問題的途徑。一切學問都是有系統的論證。無論以「是」或「否」來答覆上述問題，固然可經由其他方面，或者僅就現實的某幾點事實來加以論證，然根本的有系統的論證，必須經由中國的歷史和思想史，至少經由一百三十年的歷史和思想史的探討來論證；而答覆則可能有四種模式，即：

一、在中國對外來壓力之應付中，由洋務運動到共產主義的過程大體上是正確的；因此共產主義是當然的立國之道。

二、由洋務運動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在前幾個階段不一定是正確的，而在後幾個階段，才是正確的；這也可以達到肯定共產主義的結論。

三、（與二對照）由洋務運動到共產主義運動的過程中，在前幾個階段是正確的，而到後幾個階段則是錯誤的；這可以達到否定共產主義的答案。

四、（與一對照）在中國立國之道之探求中，在基本的方向上，自始是錯誤的。洋務運動到共產主義都是外部的連續壓力與自身的理解與應付之連續錯誤的結果。然中國不會永遠錯誤。所以共產主義必因中國走到正道之上而歸於淘汰。

無論任何一型的判斷，無論說正確和錯誤，必須指出正確或錯誤之點在於何處。如是才能確定是否應該贊成共產主義，或應該如何求正確的立國之道。

同時，我們要注意這四型答案之連帶意義。如依第一型答案，則應該歸結到第二節所說的第一答案，即中國文化價值之否定。這可再分為三式。（甲）共產黨人說，因為中國的封建文化已無價值，故必為帝國主義的西方文化所代替；然資本主義文化已經沒落，故必為社會主義文化所代替；而「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基於這一推論。（乙）美國的東方社會論者說，因為東方社會及其文化不適於現代社會，故在現代文化中解體後變為共產主義社會，乃東方社會之當然命運。（丙）還有一種「落後國家工業化必以共產主義為捷徑」說，也就是落後國家過去文化只足以使自己落後，自然失去價值。

第二型答案亦為共產黨人所採取。他們說，洋務運動到新文化運動都是封建或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運動，直到蘇俄的馬列主義輸入中國，中國才有正當的道路。

第三型答案中則又有兩個主要類型。（甲）傳統派或折衷派說，因為我們忽略中體西用或忘記中國文化本位，才走上西化、俄化道路。然而這承認必須採用他人文化為「用」，也畢竟是承認中國文化本身有其不足之處。（乙）西化派說，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主流，因為我們傳統主義障礙太大，西化不力，所以才只有共產主義。

這三型答案都將全部的或部分的否定中國文化之價值。只有第（四）型的答案，才能在根本上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因為他承認一百餘年中國之失敗，只是對世界認識與應付之問題，即是應付的方法之錯誤問題，不是中國文化本身的根本毛病問題。但在此型答案中又可再分兩種：

（甲）以錯誤在沒有注意中國社會文化基礎在鄉村，所以立國之道應求之於鄉村建設。此即新傳統派（梁漱溟）之主張。

（乙）以錯誤在不知發展中國文化之方法，即不知落後國家發展工業的方法，所以立國之道應向前求合乎自己條件與需要的工業化。這是編者個人之主張。

四

我們編纂這一部書之主要動機，便是要由澈底檢討西力東來後我們的思想史，即對世界之理解、應付之得失，以判斷或

尋求我們立國之道，解決中國前途問題。同時，也有助於解決中國文化之價值問題。

以上所說的四組可能的答覆模式之中，任何人可以根據他的理由和論證，選擇其相信的一種。編者在此序中無須對這些結論加以批評，但應對編者個人之立場，即第四組之（乙）的立場說明理由，因這個立場，是我計畫和「構想」此書內容和體例之一種根據。

我認為我們對於現代列強世界及其文化之認識與應付，自魏源以來即走入一個錯誤的方向之中，忽視根本問題之所在。此自未可責備魏源；可是以後大抵一脈相承，將錯就錯，至多補偏救弊，並無根本轉向，於是由洋務運動積錯而成共產主義政權。所以必須由我們一貫的根本錯誤來重新研討新的立國之道。

這自然不是否定或輕視一百三十年來許多前輩莊嚴的心力，全民族悲壯的奮鬥，乃至在某一時期的巨大成功。這只是說，就中國民族在當代世界中的歷史任務而言，我們理解、應付、努力的總結果是失敗的。這也就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之意。而當然，失敗也是成功之母。

此一不斷錯誤與失敗之根源，可以歸結於三點：即對立國之道、為學之道之理解不足與疏失，終於對為人之道之虧失。

先說立國之道的問題。我們失敗之根源固然由於百餘年來所受外部壓力日趨嚴重，而首先實由於在長期閉關、知識落伍之後，在鴉片戰爭之時全無已知彼之明；而自此以後，對於世界的形勢，學術與思潮，以及自己所在中的地位，依然缺乏一種全局的、澈底的、客觀的了解。我們不知西力東來後，立國之道之根本問題在於落後國家之工業化，而只注意應付當前現實問題，而不探求問題之由來；或只欣賞外國思想之新奇，而不求了解一種思想之實質、有關問題和在中國之適用性。於是對於西方及列強之認識，均難免盲人摸象；因而一切應付，不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只憑道聽塗說，病急亂投醫了。

例如，李鴻章在英法聯軍之役後，說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他對此變局之全局是什麼，並無所知，除了「西人船堅砲利」之外。同樣，當陳獨秀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時，對於民主與科學並無一清楚的概念。而當他成為中共家長時，對於俄國的歷史，蘇維埃政權之由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於落後國家之意義，馬克斯主義與列寧主義之同異，以及世界的局

勢，亦無真知，除了一點唯物史觀的皮毛，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以及第三國際的「綱領」和指示之外。

甚至直至今日，我們在史學研究上，對於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仍不分明，繼續助長對於世界了解之錯誤。一個重要例子便是將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劃為「中國近代史」。這原是蘇俄人和中共的分期，他們所謂「近代」原有一定意義，即指資本主義社會；他們以鴉片戰前的中國為封建社會，以後因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來到成為半殖民地社會，如此分期，乃為他們「反帝反封建」綱領作根據。近年來西洋人亦如此分期，則代表他們的優越感，以為他們砲艦來到之前，中國還在中古時代！或者傳統的東方社會！他們的船砲才使中國近代化！但試問明朝正德年間到中國的葡萄牙人，明末到中國的利馬竇，與鄭成功在臺灣作戰的揆一，派教士來到康熙宮廷的路易十四，見乾隆的英使馬戛爾尼等，是不是「近代人」？如果是的，何以王陽明、徐光啓、鄭成功、康熙、乾隆就不算近代人呢？必須外國人將中國人打敗以後才算中國近代史之開始嗎？這不是一個「面子」問題。以中國近代史起於鴉片戰爭毫無學理根據；而這樣也就無法充分說明鴉片戰爭的原因。不能了解鴉片戰爭的一切原因，則以後中國的變化，亦不能了解。而也就不能了解中國問題之所在，確立正當的應付之道。因而也就不能判斷過去中國文化之性質，以後對外應付之得失，尋求今後正當的道路。鴉片戰後中國史只是中國近代史之一特殊時期。

航海是近代史的動力。當東西大通之時，就是全世界近代史之開始。所以中國與西方，是一同進入近代史的。在近代史之初期，中國毋寧還先進於西方。這只要想到鄭和航海早於哥倫布者八九十年就夠了。從任何方面說，中國在明代已是近代社會。可是此後中國閉關，而西方則以國民之力大舉航海。西方資本主義與科學由航海而發達。於是十七世紀以降，中國才逐漸落後於西方。由此到十八世紀末，西方以英國為首，進入工業革命，在十九世紀達其高潮，而中國則決定的落後了。所以英國成為打開中國門戶的先鋒。這不是一個鴉片問題，他們需要市場。這也不是單純通商問題，他們需要特權通商。這是帝國主義的政策問題。所謂帝國主義者，就是工業國強制前工業國為其原料產地、商品市場，資本市場的政策。中國與西方文化之真正差距，原來只隔一個蒸氣機。所謂落後根本是工業之落後。這不是中國文化之先天弱點或先天落後。

此時中國的課題，即立國之道無他，就是建立平衡的國力，發展自己的工業。唯有工業才能對抗工業。但是，一個落後

國家如何發展工業呢？首先要掌握最先進的技術，而這是世界各國相同的，而第一步是必向先進國學習的。但是，發展工業必須有一套政治、經濟制度和政策，團結和動員國民力量，利用自己的條件，依照自己需要，克服自己的困難和障礙，促進工業化之發展。但是，社會、政治、經濟的現存狀態和需要是沒有兩個國家完全相同的，因此，符合一國工業化需要和條件的新制度新政策，也是沒有一個國家的書可以照抄的。這是一套全部的重建國家工程。在西力東來之前，我們固有的一套立國之道是够用了。現在一個工業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必須有新的立國之道。這就不是過去的方式所能應付，也不是抄任何一國所能應付的，而是要由自己依據自己的需要和條件來製定的。

而除了建立平衡國力之外，我們所遭遇的國際形勢，也是獨有的；唯一近似者是「近東病夫」土耳其。無論爲了建國之需要以及鑒于土耳其之失敗，我們的外交努力，應集中於取得建立工業的時間和條件，此則應不輕啓戰端，避免大的損害，同時保持獨立立場，不捲入強權的漩渦，而至忍無可忍之時，則擇一最惡之敵，利用自己有利之條件，作戰到底，必勝而後已，使其他強盜不敢輕於侵略。

這是中國應有的立國之道。由此便可見我們開始就走上錯誤道路。我們對整個局勢及其由來與變化與自己的情況不作深入的全面的了解。最初，所謂「剿」、「撫」之爭，固皆泛談；即魏源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夷制夷」者，亦不過襲漢人抵禦匈奴之術。此後曾國藩、李鴻章之洋務，又不過魏源之說之實行，然不知船砲乃以工業爲基礎。以後的人，每責曾李不知本，其實他們不一定更爲知本。曾李以爲夷之長技在於船砲，康梁以爲夷之長技在於政法，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則以爲西洋人之技無所不長，尤在「德」賽「二」先生！既皆不知西人長技之本，實在工業，又不知政治制度不能效法西洋，而且自變法到廢科舉與學校的結果，又將中國考試之制廢掉，用人之軌道也沒有了。新文化運動造成精神真空後，繼而又以爲西洋之民主、科學依然不足，洋人之中，唯俄國洋人革命之技最長，而不研究社會主義與蘇維埃制度是否爲中國之必要。

又在一誤再誤之後，在英法聯軍之役後，不平等條約系統完成，我們的手足被人加上鎖鐐，即欲發展工業，已至爲困難；而我們爲攻打太平天國而設下的庫金，又自加鎖鐐，並相沿不改。師了三十年的夷之長技之船砲在甲午證明破產之後，